

第五章

捷克斯洛伐克：

經由一次「絲絨般的革命」邁向民主

德

德累斯頓

波

蘭

貝利雷次

赫布

布拉格

比森

伏塔

瓦河

捷克斯洛伐克

柏諾

沃斯查瓦

國

奧

地

利

維也納

多

布拉迪斯拉瓦

瑙

河

匈

牙

利

科希策

14

18

22

捷克斯洛伐克歷經共黨四十一年統治，其過程最受矚目者，乃是出現兩起截然不同的發展，並且剛好相隔二十年。其一，一九六八年震撼東歐的「布拉格之春」，是一次由上而下的改革運動，但卻不見容於莫斯科，僅僅兩百天的光景，即遭到以蘇聯為首的華約集團的武力鎮壓，而告失敗。事隔二十一年，也就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布拉格又掀起如火如荼的示威浪潮，這一次是由下而上的改革運動，在學生、知識份子和工人攜手合作下，終於迫使共黨就範，誠為和平革命的典範。本章除簡介捷克之地理形勢、民族、語言、宗教和歷史背景外，擬就捷克民主化進程、政權之轉移及新政府的經濟改革等加以深入探討，期能瞭解捷克如何由共黨「一黨專政」體制轉換為「多黨民主」的國家，以及「計畫經濟」如何過渡到「市場經濟」等其他東歐國家亦普遍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

此外，值得首先一提的是「十一月革命」成功之後，捷克國號由「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Czechoslovak Socialist Republic)更改為「捷克暨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Czech and Slovak Federal Republic)。其中為顯示境內兩大民族之地位平等，在國名上把捷克與斯洛伐克刻意分開。國人一向把這個中歐國家稱為「捷克」是不正確的，即使稱為捷克斯洛伐克亦與原意不合。不過本章仍使用「捷克」，以收簡便及符合一般讀者習慣。

壹 地理形勢

捷克和匈牙利一樣，是位處中歐的一個內陸國。土地面積十二萬七千八百六十九平方公里。人口依一九八九年估計有一千五百七十七萬四千人，其中百分之七十四居於都市，百分之二十六住在鄉村地區，為東歐國家中人口都市化比例最高的國家。首都布拉格(Prague)是全國最大都市，人口一百一十九萬，具有悠久的歷史文化，曾是神聖羅馬帝國(The Holy Roman Empire)的政經中心，其他較大的都市有：

布拉迪斯拉瓦(Bratislava)：四十一萬人。

柏諾(Brno)：三十八萬四千人。

沃斯查瓦(Ostrava)：二十二萬六千人。

捷克為一東西狹長的國家，北與波蘭交界，南接奧地利和匈牙利，東是蘇聯，西鄰德國。全境是崎嶇的山地、平緩起伏的丘陵和肥沃的平原，大致上可分為七大地區：

一、波西米亞山區(The Bohemian Mountains)

位於捷克最西端，包括富藏煤與鈾礦的沃瑞山脈(Ore Mountains)和重要木材產地的波西米亞林區。此區由於礦業與製造業發達而人口稠密。山的高度平均只在海拔七百六十公尺左右。

二、蘇德台山區(The Sudetes Mountains)

位於中北部，與波西米亞山區一樣，工業亦甚發達。

三、波西米亞盆地(The Bohemian Basin)

由低平的平原和起伏的丘陵構成。源於四周山區的諸河流如伏塔瓦(Vltava)河、薩查瓦(Sázava)河及貝倫卡(Berounka)河等匯集於首都布拉格後成為易北(Elbe)河，經德國入北海。這裏是捷克廣大的農業區，生產馬鈴薯、裸麥、甜菜和小麥等。捷克的幾個主要工業區也都是環繞著盆地的幾個重要城市發展。

四、波西米亞—摩拉維亞高地(The Bohemian-Moravian Highlands)

主要是小山與低矮的高原，大多為農地，以產啤酒著名。

五、摩拉維亞低地(The Moravian Lowlands)

位於捷克中部，主要是摩拉維亞河谷。此地區除農、牧業外，捷克最重要的煤田也在這裏，人口稠密，工業城柏諾是捷克第三大城。第四大城沃斯查瓦則為此地區的主要煤產中心。

六、多瑙河低地(The Danubian Lowlands)

土地肥沃，主要生產玉米、小麥等。布拉迪斯拉瓦是這個地區主要且唯一的工業中心，也是全國第二大城。

七、西喀爾巴阡山區(The Western Carpathians)

主要在斯洛伐克(Slovakia)境內，風景優美，人口密度不高，為捷克主要的休閒勝地。畜牧業和林業甚發達，科希策(Košice)是唯一的製造業中心，其附近蘊藏鐵礦。

一般來說，捷克是屬大陸型氣候，一月平均溫度為攝氏零下二度，七月為攝氏十九度，平均

年雨量是七一〇公釐。

貳 民族、語言與宗教

在捷克一千五百七十多萬人口中，捷克人(Czechs)約佔三分之二，斯洛伐克人(Slovaks)約佔三分之一，其他少數民族主要是匈牙利人，約佔百分之三·八，另外有日耳曼人、猶太人、吉普賽人、波蘭人和烏克蘭人等。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同屬斯拉夫民族，約在西元四百年進入目前捷克這塊地方。捷克人主要集中在波西米亞和摩拉維亞地區，較受日耳曼文化影響；斯洛伐克人主要集中在今日斯洛伐克地區，受匈牙利人影響。波西米亞和摩拉維亞兩地在十九世紀已成為工業中心，而斯洛伐克則至今仍是農業區。

語言上，捷克語與斯洛伐克語同為官方語言，但兩者非常近似，溝通並無困難，一般人民也都具有這兩種語言能力。知識分子、作家和藝術家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相當崇高，現任也是戰後第一位非共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即是捷克一位備受尊重的作家。早期作家如哈謝克(Jaroslav Hašek)、卡夫卡(Franz Kafka)和近代流亡法國的昆德拉(Milan Kundera)都具世界知名度。音樂家如史麥塔納(Bedřich Smetana)和德弗札克(Antonin Dvořák)的音樂更是緊扣世人的心弦。由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四世(Charles IV)於一三四八年在布拉格設立的查理大學是歐洲最古老的大學之一。布拉格文化圈在近代歐洲學術界亦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宗教信仰方面，一九四八年共黨掌權後即發動反宗教鬥爭，教堂被沒收，許多傳道人亦被捕入獄。共黨垮台後人民才重獲信仰自由。一般來說，人民中約有三分之二屬羅馬天主教，其他三分之一則是基督新教。此外尚有少數的猶太教與捷克斯洛伐克東正教。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及其後的許多反對運動中，基督徒團體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叁 歷史背景

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大約在西元四〇〇年定居在現今捷克這塊地方。西元九世紀中他們曾聯合起來建立了一個大摩拉維亞帝國(The Great Moravian Empire)，版圖涵蓋了大部分中歐。不過此一帝國在西元九〇〇年左右被匈牙利人所滅，此後約一千年之久，今日的斯洛伐克地區一直在匈牙利人的統治之下，其餘地區則分裂成許多小城邦。不過波西米亞地區約在西元九〇〇年曾興起一個半獨立的王國，由普瑞米斯里德家族(The Přemyslide Family)治理，附屬於神聖羅馬帝國。西元十四世紀，在神聖羅馬帝國查理四世的統治下，波西米亞的文化與政治達於巔峯，布拉格成為帝國的政經中心。

約翰·胡斯(John Hus)，一位比馬丁·路德更早的波西米亞宗教改革者在一四一五年被以異教徒的罪名燒死後，波西米亞即陷入長期的內戰。胡斯的追隨者與忠於羅馬教廷者的戰爭一直持續到一四三六年才達成和解。十五世紀末期，由於積弱不振，波西米亞曾受波蘭短暫的統治。

西元一五二六年，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I)成為波西米亞和匈牙利的國王。在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波西米亞仍能維持半獨立狀態。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運動在整個歐洲如火如荼展開。捷克人雖在忠於羅馬教廷的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但繼承胡斯的改革傳統，許多捷克人成為宗教改革的支持者。一六一八年一羣捷克新教徒發動革命，反抗哈布斯堡王朝，選出一位新教徒國王，此舉觸發了遍及整個歐洲的三十年戰爭(The Thirty Years War)。

一六二〇年，捷克人在白山戰役中為王朝軍隊擊敗，波西米亞遂喪失其自治權，且被分成波西米亞、摩拉維亞和西利西亞(Silesia)三個省份，由王朝直接統治。捷克人被迫接受日耳曼語言與文化，且羅馬天主教重新成為國教。一七一四年，普魯士雖征服了大部分的西利西亞，但波西米亞、摩拉維亞和小部分的西利西亞仍在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

從十八世紀末期開始，拜豐富的礦藏之賜，波西米亞與摩拉維亞地區已開始工業化，許多捷克農人湧入都市。到十九世紀中葉，捷克人在這兩個地區的許多城鎮中已取代日耳曼人，成為最大的人口羣。與此同時，許多捷克人開始推動捷克母語與文化的再生運動，並隨著民族情緒的高漲而要求自治權。在奧匈帝國匈牙利統治下的斯洛伐克人亦同樣展開類似的運動，然而受到鎮壓。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波西米亞地區的革命活動有增無已。許多革命分子被逮捕。不過一九一六年，逃至法國的兩個捷克民族主義領袖馬薩利克(Tomáš G. Masaryk)和貝內斯(Edward Beneš)在巴黎結合同一些捷克及斯洛伐克領袖，成立「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員會」(The Czechoslovak National Council)，尋求外國的支持，致力於使捷克人及斯洛伐克人合組成一個獨立的國

家。這個委員會終於在一九一八年被同盟國承認為新國家「捷克斯洛伐克」的臨時政府。同年，隨著奧匈帝國的解體，這個包括波西米亞、摩拉維亞及斯洛伐克三地區的新國家也正式成立。一部進步的憲法使捷克成為一體制相當良好的民主共和國。第一任總統是開國功臣馬薩利克，一直到一九三五年由貝尼斯接任。這個國家由於繼承了奧匈帝國百分之七十的工業力量，因此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已是一個相當工業化的國家。不過由於民族問題，整個一九三〇年代並不安定，斯洛伐克人抱怨政權皆由捷克人把持，住在蘇德台區的日耳曼人也反抗捷克人的統治。尤其後者後來成為德國希特勒入侵捷克的藉口，也揭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

一九三八年法、英、義與希特勒簽訂慕尼黑協定(Munich Agreement)，默許希特勒對捷克的領土要求。一九三九年，捷克政府向希特勒屈服，德軍遂佔領整個捷克。在德軍佔領期間（一九三九—一九四五），反抗運動在捷克各地展開，人民也受到德軍殘酷的迫害。因此而死亡的捷克人總計大約有二十五萬名。

二次大戰期間，貝尼斯在倫敦成立流亡政府，與西方國家及蘇聯合作，一九四三年他並且與蘇聯簽訂一項友好與合作條約。一九四五年蘇聯紅軍從德軍手中解放了大部分的捷克，美軍亦使部分波西米亞重獲自由。二次大戰結束後流亡政府遷回布拉格，所有外國軍隊，包括紅軍，也都撤出捷克領土，不過在這同時捷克也把魯勒尼亞(Ruthenia)割給蘇聯。

貝尼斯回國後成立一個包括捷克共產黨的聯合政府。捷克共產黨早在一九二一年即已成立，在大戰前頗為健全的捷克民主政治中，它是在合法的情況下活動的，並且得到人民相當程度的支持。二次大戰後的聯合政府中共黨獲得幾個重要的職位，並且有蘇聯在背後撐腰。一九四六年五

月舉行的戰後大選中，捷共贏得百分之三十八的選票，其原因是捷共在戰前即已是一個頗受肯定的合法政黨，同時捷克人對於紅軍解放捷克亦心存感激之故。這使它得以組成一個聯合政府。捷共領袖得任聯合政府總理。在一九四七年的地方選舉中，共黨所獲得的支持率又更上層樓。

然而捷共顯然並不以此為滿足。一九四八年二月，在共黨領袖哥特瓦德(Klement Gottwald)的策劃下，共黨利用一次政府危機，一舉迫使十二名其他非共內閣部長辭職。貝尼斯被迫得組成一個全屬共產黨員及其支持者的內閣。幾個月後貝尼斯也辭去總統一職，接任者即哥特瓦德。同年六月九日，捷克宣布成為一個由捷克社會主義共和國及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所組成的人民共和國。在經濟和政治方面都遵循史達林模式。私有經濟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同時進行。在政治上，秘密警察開始迫害非共及反政府人士，共黨本身也進行黨內鬥爭。這種路線在一九五三年史達林和哥特瓦德去世，查波托斯基(Antonín Zápotocký)繼任後都沒改變。一九五七年諾瓦特尼(Antonín Novotný)成為捷克總統後，仍採史達林主義，經濟日益惡化。

肆 民主化因素

從一九四八年捷共取得政權至一九八九年，這四十一載當中，前二十年捷共政權分別由三位領導人主政，即哥特瓦德(一九四八到一九五三年)，查波托斯基(一九五三到一九五七年)，以及諾瓦特尼(一九五七到一九六八年)。根據這二十年政治發展的諸多跡象顯示，研究學者把它歸納

爲：史達林主義成長時期（一九四八—五三年）、史達林主義茁壯時期（一九五三—五七年）、史達林主義委靡時期（一九五七—六三年），以及史達林主義癱瘓時期（一九六三—六八年），這正反映以上三位捷共領導人的角色與外在環境的互動關係。一九四八年，狄托（Josip Broz Tito）與史達林決裂，南斯拉夫被趕出「共產情報局」（Cominform），捷共在史達林的支持下，剛剛取得政權，自然要站在莫斯科這一邊。因此，哥特瓦德隨即師承史達林的手段，開始整肅異己。一九五三年三月，史達林暴斃，蘇共領導階層出現權力鬥爭。一九五六年二月，蘇共召開「二十大」，赫魯雪夫發表所謂的「秘密演說」，批判史達林，隨後鞭屍。顯然地，莫斯科政策的轉變對東歐國家也帶來了相當程度的衝擊，導致波蘭和匈牙利出現自由化運動。本來這段時間，捷克斯洛伐克也有民主化的機會，但因波蘭和匈牙利的自由化，均遭到莫斯科的干預或鎮壓，使得布拉格當局採取更強硬作風。一九五六年爆發的皮爾森（Pilsen Pilsen）事件，捷共即毫不手軟的以武力鎮壓了工人的反共怒火，在諾瓦特尼掌權十年中，由於保守派和改革派僵持不下，經濟改革失敗，知識分子不滿情緒日益升高，終於逐漸醞釀「布拉格之春」的改革動力。

據一九八七年統計，捷共擁有黨員一百七十萬人之多，約佔其總人口的十一%。照理說，共產黨憑著憲法中保障「一黨專政」的條款，足以壟斷所有勢力和國家資源，情治系統密布全國每個角落，大可爲所欲爲。可是，布拉格當局何以會在八〇年代和九〇年代交替之際，在陰溝裏翻船，把四十年來牢牢築起的紅色政權，僅在一個月之間拱手讓給反對勢力！波蘭和匈牙利的民主改革，基本上，是經過相當一段時間的醞釀，才有所突破。那麼，捷克斯洛伐克是在什麼背景下，導致發生一場頗引人津津樂道的所謂「天鵝絨革命」（the velvet revolution）呢？一般認爲，民

主化的條件因國情不同，很難建立一套通則。不過，其內外在條件還是可以找出端倪。就內在條件而言，可能涉及一些因素，如領導階層特質、政治文化、經濟發展程度、社會流動（自主性），以及教育水平等等；而就外在條件而言，則基本上來自國家間的互動關係，和國際社會的壓力。從捷克斯洛伐克邁向民主化的背景看來，其主要影響因素，大體上可就下列兩方面分析：

首先，內在條件這一方面，可歸納三項基本因素：

一、政治因素

自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布拉格之春」的改革運動遭到封殺之後，捷共保守派接掌政權，政策改弦易轍，史達林主義的統治模式又重新運作。其中最引人側目者：其一，整肅異己，把黨內所有支持「布拉格之春」的幹部或黨員，幾乎全部清洗出黨，據估計至少有五十萬名黨員遭開除。其二，加緊控制思想和實行嚴格新聞檢查，採高壓手段，嚴禁各項非官方的公開性活動。因此，七〇、八〇年代，捷克斯洛伐克迫害人權的記錄，已惡名昭彰，引起國際社會的關切。至於一九八五年三月，戈巴契夫就任蘇共總書記之後，由於克里姆林宮一反過去大幅調整內外政策，展開一系列所謂「改造」和「公開性」的新措施。莫斯科政策的轉變，使布拉格當局進退維谷，難以適從。因為若配合戈巴契夫的改革方針，等於肯定了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的正當性，這無異說明了鎮壓當年的改革運動是錯誤的行爲。相反的，如抗拒改革，非但不符合蘇聯的現行政策，恐遭非議，而且亦將更難擺平黨內外要求改革的壓力。一九八七年捷共領導階層已擺出有意進行改革的姿態，但因權力核心老化，領導人胡薩克(Gustav Husak)逾七五高齡，政策依然保守，改革進程極爲緩慢。在這種情況下，捷共已陷入困境，喪失民心，正如哈維爾所說，處於「壓

力鍋」狀態，隨時有爆炸的可能。

二、經濟因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捷克斯洛伐克曾是排名世界第十大工業發達國家，機械、化工、汽車以及軍火等工業均名聞遐邇。可是，戰後共黨接管政權之後，經濟發展每下愈況，不但無法達成每年規定的成長指標，而且人民生活水平呆滯不前，少有改善。六〇年代諾瓦特尼當政時，即試圖扭轉經濟窘境，乃委託當時著名經濟學者錫克教授(Ota Sik)研擬經濟改革方案。錫克教授曾提出「以市場導向的社會主義」模式，但因在黨內引發路線之爭，仍難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致使經改無法落實。及至一九六八年二月，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接任捷共中央第一書記之後，即以推動「具有人道色彩的社會主義」自許，力求變法圖強，同時展開政治和經濟改革，於是「布拉格之春」不同凡響，舉世矚目，可惜，僅僅兩百天的壽命即告夭折。自此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濟發展再度局限在馬列教條的窠臼裏，無從發揮。從某些現象，即可證明捷共領導階層在處理經濟問題時，已束手無措，無能為力。最顯明的例子，如工業設備陳舊，效率低落，生產力和品質逐漸下降，已失去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再者，環境污染嚴重，全國林地有三分之一受到酸雨破壞，農業生產亦遭波及。一九八七年三月，捷共召開中央全會時，除了高度評價蘇共的改革措施外，並決議進行「經濟機制改革，調動社會各方面積極性和有效地把科技的成果應用於實踐問題」。不過，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濟沉痾，已不是修修補補的改革手段所能克服，人民對捷共政權已完全失去信心。

三、社會因素

一九六八年由杜布切克領導的「布拉格之春」改革運動，雖然遭遇外力的干涉而宣告失敗。但從種種跡象顯示，「布拉格之春」的精神深植民心。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非但對杜氏所開創的「布拉格之春」記憶猶新，念念不忘，而且對保守頑固的捷共當權派不時發出不平之鳴，其中最突出的一些現象，諸如一九七七年成立的「七七憲章」人權團體，即糾合作家和藝術家等文化界知識分子，揭開捷共當局迫害人權的事實，同時逐漸形成對抗共黨的核心組織，並為爾後「公民論壇」成立的主要催生力量；每逢八月二十一日和一月十五日或明或暗紀念「布拉格之春」，藉機抗議，並以「布拉格之春」之名舉行音樂季活動；環保意識抬頭，青年學生名正言順，乘機活動，光在一九八八年即有三十個不同形式的團體，先後成立，成為反抗共黨政權的生力軍；最後，教會的角色舉足輕重，雖然屢遭共黨壓迫，但在緊要關頭，都能挺身而出，一方面掩護反對勢力，另一方面扮演潤滑劑，紓解社會衝突。八〇年代波蘭天主教會的一舉一動，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天主教會也直接地發生了鼓舞作用，使其敢於動員羣衆力量，幾可使共黨喪膽。因此，「十一月革命」爆發時才有所謂「絲絨般」溫和的過程。

其次，在外在條件方面，這可以說是捷克斯洛伐克邁向民主化的「大氣候」。換言之，布拉格沒有這股「大氣候」的形成，光是內在的「小氣候」環境，是不是足以匯合一股強有力的風潮，把根深柢固的「紅色大樹」推倒？不無疑問。因此，一般咸信，導致捷克斯洛伐克走向民主之路，國際因素才是主要關鍵。

四、國際因素

一九六八年由上而下的一次改革運動，因為沒有外在條件的配合，終於悲劇收場。當時蘇共

領導人布里茲涅夫認為，做為「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成員，就得要遵守共同規律，不得擅自改變路線或脫離「社會主義大家庭」，否則這個大家庭有責任進行干預，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成員，其國家主權是有限的。不過，二十年後，蘇共新一代領導人上台，卻一反過去，竟以所謂「新政治思維」出發，不惜放棄「唯我獨尊」的霸權政策。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排除「布里茲涅夫主義」的陰影，而促使東歐局勢快速變化，乃得力於戈巴契夫實行「新政」的結果。至於直接影響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改革的主要關鍵為何？基本上可歸納三項決定因素：其一，一九八七年四月，戈巴契夫訪問布拉格，公開宣示「社會主義建設的多樣性」，沒有統一的模式。戈氏更直截了當的表示，「任何黨不能壟斷真理」，這無疑地間接平反了「布拉格之春」事件，等於鼓勵捷克當局，你們盡可放手改革。其二，波蘭和匈牙利先後出現劃時代的創舉，前者成立了東歐第一個「非共」領導的政府，而後者竟然革了共產黨的命，首次開啓共產黨自行廢黨，宣布與馬列主義決裂的先例。波、匈兩國這種驚天動地的變革，莫斯科並未加干預。其三，一向以正統馬列主義自居的東德，一直被認為政局最穩定，是華約集團最可靠的盟友。可是，東柏林政權卻是那麼脆弱，居然在難民潮和羣衆示威的怒吼下垮台。很明顯地，捷克斯洛伐克在這樣外在環境的刺激下，沒有理由可以擺脫「骨牌效應」的衝擊。

伍 「布拉格之春」的衝擊

無疑的，討論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進程，基本上應以一九六八年作為分水嶺。因為，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的改革運動，非但對捷克斯洛伐克本身奠定思想啓蒙的基礎，而且也為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在「更新社會主義」的倡導下，提供了具有催化作用的啓示。例如蘇共新黨章所揭櫫的「人道和法治的社會主義」，與杜布切克所倡導的理念不謀而合。

為敘述方便，使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進程有個脈絡可循，筆者擬將整個民主化進程歸納為五個時期。

首先，是以「布拉格之春」為主的前兩個時期：

一、民主化起步時期（一九六八年二月至八月）

杜布切克是斯洛伐克人，一九六八年一月，他以四十七歲壯年脫穎而出，擢升共黨中央第一書記，誠非易事。杜氏年幼時，曾隨父旅居蘇聯，並完成中小學教育，於一九三八年返國。次年，加入共產黨。杜氏是一位民族主義者，在納粹佔領捷克斯洛伐克期間，曾參與反納粹地下活動，兩度受傷。一九五五年，由於他表現傑出，獲保送進入莫斯科高級政治學校深造，三年後，學成歸國。至一九六八年這十年中，他的仕途可以說平步青雲，極為順暢。一九六〇年出任斯洛伐克共黨第一書記，同時亦為捷共中央主席團成員，或許杜布切克在莫斯科求學期間，經歷過史達林和赫魯雪夫兩位截然不同的領導風格，感觸良多，尤其對赫魯雪夫敢於向根深柢固的權威偶像開刀，打擊官僚惡習，展現改革新氣象等等作為，留下深刻印象而激發他日後的改革動機。杜氏接掌捷共領導人之後乃一反過去，大刀濶斧進行改革，其民主化的具體表徵，謹舉其要者：

（一）實行黨政分離。杜氏放棄往昔慣例，集黨政大權於一身，國家總統改由史沃伯達（Ludvík

Svoboda)就任，他專任共黨第一書記。

(二)頒布新的行動綱領。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三日發表了民主改革的行動綱領，其主要內容為：

(1)經濟方面——企業管理權下放，「經濟計畫」受國民議會的監督，重視市場的積極功能，企業單位負責人經由民主方式產生；工人會議代表有權過問經濟管理，農業合作社有獨立權，小企業有合法地位。(2)政治方面——停止黨與國家機關、經濟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的相互關係；黨的決議，僅對在各單位中工作的黨員有約束，黨員在黨內不僅有權，而且有義務發表不同意見；人民的自由或政府的干預，應以法律為依據；取消秘密警察的特殊地位；人民有自由行動權，包括赴國外旅行。(3)文化方面——藝術完全自由。這是蘇聯集團中最富自由色彩的政策聲明。

(三)取消新聞檢查。容許大眾傳播媒體對時政的批評，一向為共黨控制的作家協會如魚得水，百家爭鳴，呈現空前的創作自由。

(四)允許某種程度政治多元化。議會已不再是共黨的橡皮圖章，可以公開自由辯論，得對政府官員提出不信任案；國會委員會能夠發揮審計或調查的功能，五月，頒布大赦令，釋放政治犯。

(五)社會團體的自主性抬頭。傳統上由共黨控制的羣眾組織——作家聯盟、新聞記者聯盟，以及其他職業聯盟等，其所屬次級團體，如雨後春筍，紛紛脫離自立門戶。其中最受注目者，由異議分子籌組的團體如「231俱樂部」和「KAN俱樂部」等尤為活躍，這種自主性，都是過去共黨政權所不容許的。

二、民主化停滯時期（一九六八年九月至一九八五年三月）

「布拉格之春」在布里茲涅夫「有限主權論」的威嚇下，僅曇花一現，悲劇落幕。從此，捷

克斯洛伐克又回到獨裁統治的老路，歷時十七年之久。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蘇聯率領波蘭、東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等華約國家軍隊，利用凌晨時刻大舉入侵同屬華約集團的捷克。根據塔斯社事後發表的文件指出，華約五國之所以進兵布拉格，係應「捷共和政府領袖之緊急援助請求」。事實上，這完全是莫斯科爲了「師出有名」捏造出來的託辭。當時，克里姆林宮真正擔心者，乃是捷克的自由化不僅直接傷害共黨集團的政治利益，而且也可能間接影響鄰近東歐國家紛紛效法跟進，終而導致社會主義大家庭的解體。因此，克宮領導階層從杜布切克一上台所展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開始，即頻頻感到不安，曾多次施壓，諸如透過媒體的警告，公開場合的抨擊，甚至舉行攤牌性的談判。最終莫斯科深感「事態嚴重」，唯恐若是容忍「布拉格之春」開花結果，此例一開，其後果堪虞。所以，蘇聯乃以華約之名，動兵平息了這一場轟動國際的自由火花。自此所謂的「布里茲涅夫主義」的陰影一直籠罩整個東歐，尤其捷克遭遇到嚴重打擊，致使民主化的腳步完全停頓下來。在這二十年當中，捷共政權所作所爲，更趨頑固保守，謹舉其要者列舉如下：

(一)進行大整肅運動，杜布切克及其改革支持者悉數被開革出黨：杜氏在華約之軍隊入侵捷克前夕，曾被押解前往莫斯科，在克宮逼迫下同意辭職。由於杜布切克在國際社會享有改革者的美譽，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擁戴，蘇共當局不敢草率以「反革命」罪名拘捕，至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七日始正式解除捷共第一書記職務，轉任國民議會主席（四月至九月），隨後短時間奉調駐土耳其大使，到了一九七〇年所有黨內職位全被解除。同年六月，杜氏的共產黨員身分亦難確保遭開除，由此行動受到監視近二十年。當時，約有五十萬名捷共黨員，因支持改革同遭整肅清洗。

(二)修改憲法，調整國家機器：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一年曾兩度修憲，強化中央集權，使一九

一八年建國以來地方分權的色彩完全改觀。胡薩克接替杜布切克就任捷共第一書記後，隨即把共黨領袖頭銜更改為總書記，向莫斯科看齊。胡氏並於一九七五年起兼任總書記一職，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

(三)對蘇聯的政策唯命是從：一九七〇年蘇捷簽訂友好條約，有關「有限主權論」之說並列其中，使莫斯科率領華約集團的入侵行動合法化。一九七一年捷共召開「十四大」，所有改革派全被開革，親蘇的保守派重新控制整個官僚體系。從此，蘇聯的意志若隱若現地左右捷克政局。

(四)異議分子揭櫫「七七憲章」，展開人權運動：一九七七年一羣對捷共政權的不滿分子，依據聯合國人權宣言和赫爾辛基最後文件的精神，發起簽署所謂「七七憲章」。參與該項憲章的異議分子絕大多數是作家、音樂家、記者、醫生、教士等知識分子，如哈維爾、丁斯特皮爾(Jiri Dienstbier)等著名人士，後來均出任政府要職。該團體的主旨即提醒國際社會對捷共政權迫害人權記錄應寄予關切，並期望扮演政府與不滿民衆之間調停者的角色，俾減輕社會衝突。儘管此一不滿團體的活動符合捷克法律規定，但仍被布拉格特務機關視為眼中釘，活躍分子屢遭逮捕和迫害。

(五)繼續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改革停擺，經濟發展呆滯：捷共在一九七一年召開的「十四大」時，宣稱「已克服了黨內和社會上的危機」，經濟方針提出在充分利用集約化增長因素的基礎上不斷全面提高國民經濟發展效率。一九七六年的「十五大」和一九八一年的「十六大」，老調重彈，要進一步完善計畫和管理工作，並在工農業領域貫徹實施。其實，這些都是不切實際的官樣文章，根本無法因應二次能源危機的衝擊，導致八〇年代之後，經濟發展每下愈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已非昔日所可比擬。

陸 「十一月革命」的近因

一九八五年三月，年輕的蘇共領導人戈巴契夫上台之後，由於標榜「新政治思維」，大力倡導「改造」和「公開性」政策，使得東歐國家發生空前的變革，捷克亦在此一大潮流中逐步向民主推進，終得完成「十一月革命」的壯舉，特將其進程以三時期分析如下：

一、改革觀望時期（一九八五年三月至一九八七年四月）

當莫斯科開始改弦易轍時，布拉格當局自然不能視若無睹，毫不理會。不過，採強硬路線的捷共領導階層對「布拉格之春」的悲劇記憶猶新，若盲目跟近，無異自毀立場，等於承認鎮壓一九六八年的改革運動是錯誤的。況且，胡薩克領導班底，可能還心存疑慮，戈氏的領導地位是否鞏固。因此，自一九八五年蘇共新的權力核心接班之後兩年期間，布拉格的掌舵手基本上是採觀望態度，並沒有積極回應莫斯科的改革方針。此一時期，較受注目的作為如下：

（一）一九八六年三月廿四至廿八日，捷共召開「十七大」，通過一九八六—九〇年經濟和社會發展主要方向，以及至二〇〇〇年遠景規劃等。隨後，胡薩克第五度當選捷共總書記。本次黨大會所通過的綱領仍甚保守，並未如同蘇共「廿七大」具體的勾劃改革步驟與方向，做了突破性的調整。同年六月十三日舉行聯邦議會改選，捷共在議會的席次一直控制三分之二以上，其餘則分配給尾巴黨或親共的無黨籍人士。

(二)一九八七年三月，捷共召開中央全會，對莫斯科所推行的改革政策首度表示一致支持和高度評價。同時，討論準備進行經濟機制改革和進一步發揚民主、調動社會各方面積極性，以及有效地應用科技成果於實踐問題上。顯然地，布拉格當局的體認到克宮的「方向球」至為明顯，非得「見風轉舵」不可。

(三)戈巴契夫正式走訪布拉格，揭示莫斯科的「新東歐政策」。戈巴契夫就任蘇共領袖兩年之後，於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才到捷克進行三天的官方訪問，並在蘇捷友好協會發表政策性的演說，首次正式揭示莫斯科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新政策方針。戈氏在該次演說中提到三點，特別受到注目：其一，社會主義建設可根據本國的條件，選擇發展的道路。其二，尊重獨立自主，平等互惠。其三，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應相互學習，沒有「共同規律」，任何黨不能壟斷真理。無疑地，戈氏這一席話標誌著兩項劃時代的意義：第一，肯定社會主義建設多元化發展的可行性。第二，等於宣告布里茲涅夫主義已經死亡。戈巴契夫新東歐政策的宣示，的確為東歐民主化鋪平道路。

二、改革再出發時期（一九八七年五月至一九八九年十月）

布拉格面對戈巴契夫推行的「新政」，以及咫尺相連的波蘭和匈牙利洶湧澎湃的民主化浪潮，不得不順應時勢，改變既定政策。因此，自戈巴契夫訪問捷克之後，即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逐步推出。由於「布拉格之春」的複雜情結，加上克里姆林宮對該事件的是非依然保持緘默，致使捷共當局在改革進程上，猶豫不決，遠不如波、匈兩國那麼勇往直前，僅採小步伐漸進策略。這一時期最突出的作為，簡要列舉如下：

(一)領導階層改組。在位十九年的胡薩克，以七十五歲高齡年老體衰為由，於一九八七年十二

月十七日辭去捷共總書記一職，遺缺由負責經濟事務的政治局委員雅克石(Milos Jakes)接任，但胡氏仍保留總統職位。次年十月，聯邦政府人事大調動，在位十八年的總理史特勞加爾(Lubomir Strougal)被革職，改由溫和派的阿達梅茨(Ladislav Adamec)升任。捷共更動領導階層，乃期望克服日益惡化的經濟困境。不過，新領導班子的作風，仍保守有餘，創新不足，只在經濟領域進行小幅度的改革，既不徹底又不敢觸及政治體制。

(二)逐漸突破「政治禁區」，異議分子敢向共黨極權挑戰。首先是領導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的領袖杜布切克再度露面，於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出國接受義大利波隆尼亞大學榮譽博士學位，並公開發表演說，批評捷共迫害異己情況，對外力干預十八年前的改革予以譴責。其後，杜氏在一九八九年三、四月間，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美國之音以及匈牙利國營電視台等外國媒體訪問時，亦毫不掩飾的敘述他當年的改革政策，無怨無悔，但要求重新評價「布拉格之春」的始末，還他清白。於此同時，他也積極聲援異議團體的活動。緊隨著杜氏的公開露面，異議分子開始展開整合，一九八九年六月，波蘭「團結工會」在大選獲勝，使東歐國家的反對勢力士氣大增。杜氏的異議團體隨即「乘勝追擊」，聯合兩千餘名文化界人士和著名異議分子，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向政府公開發表所謂「數句進言」請願書，要求「真正對話」、「真正改變」與「廣泛的政治改革」。這份以「幾句話」為標題的請願書特別呼籲，「改變社會氣候作為走向真正改革的第一步」，尤其是「立刻釋放政治犯」，與給予集會結社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該請願書同時要求「廢除一切形式的政治控制和審查」，對可能嚴重影響環境的工程，需適當執行公眾意見。儘管這份請願書遭到捷共機關報「紅色權利報」尖銳的批判，指為「出賣社會主義」。不過，此項請

願甚得社會共鳴，增強了爾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推翻共黨政權的動力。

(三)紀念「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廿一周年，布拉格市中心二十年來，首度聚集數萬人大規模示威活動，並有來自義大利、波蘭和匈牙利的支持者參與聲援，場面甚為緊張。警方曾逮捕三百餘人，參加示威的外籍人士悉數被驅逐出境。事後，捷共領導階層一再聲明，拒絕波、匈模式的改革。惟布拉格領導班子的態度，似有改變過去強硬作風的跡象。總理阿達梅茨於十月訪問維也納時，首次向記者表示，一九六八年發生的「布拉格之春」改革運動之中的，確有部分「良性因素」。隨後，阿氏又公開聲明，他支持廣泛「民主」，但必須在穩定的局勢下維持秩序和法律。不過，捷共政權仍「抱殘守缺」，不肯與反對團體對話，不容許動搖共黨的領導地位。

(四)研擬經濟機制改革措施，以紓解內部日益升高的壓力。聯邦政府與兩個共和國政府於十月二日舉行二十年來第一次聯席會議，討論實施經濟機制改革問題，期能統一步驟，為一九九〇年起在國民經濟各部門全面貫徹新的經濟機制原則作為準備。其主要手段即通過嚴格控制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和提高消費品生產來解決國內市場的平衡問題。不允許無計畫的增加基本建設，並不再增加外債。

(五)東德的難民潮、匈共的宣布廢黨，以及何內克的垮台等劃時代的變化，不僅直接對捷共造成莫大的心理壓力，同時也鼓舞了反對勢力的勇氣和信心。十月二十八日是捷克斯洛伐克獨立紀念日，異議分子乃藉此機會發起慶祝活動，共有一萬多人走上布拉格市中心廣場，他們敢公開向捷共挑戰，要求雅克石下台，並立即進行對話。這是二十多年來最大規模的示威抗議活動。布拉格行政當局已深切體認，改革潮流無可抗拒，隨後宣布放寬人民出國限制，准許自由赴西方國家

旅行。

三、實現民主化時期（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迄一九九一年）

隨著波蘭和匈牙利民主化的快速進展，以及「柏林圍牆」突如其來的倒塌，捷克內部也像骨牌效應般地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布拉格共黨領導階層所執行的小步伐改革政策，不僅無法滿足內在日益高漲的改革運動之要求，而且也不能配合外在環境的現實，尤其莫斯科都已明確揭櫫「改造」和「公開性」政策，捷共沒有理由故步自封，再繼續抗拒民主潮流。因此，當十一月中旬開始掀起一連串空前的示威浪潮後，僅僅八天，捷共被迫向廣大羣衆低頭，交出權力。爲時二十一載的布拉格冰冷的政治氣候，神乎其神的回到充滿希望的「春天」，等於完成了一次「絲絨般的和平革命」。此一過程最突出的特點，可歸納如下：

（一）和平革命的導火線：原來爲紀念五十年前（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因抗議納粹佔領而遭殺害的學生，後來卻演變成對民主的訴求，終於觸發了所謂「布拉格的十一月革命」。十一月十七日這一次的紀念活動，最具諷刺意義的是，策劃者是捷共外圍組織「社會主義青年聯盟」，這些大學生首先在查爾斯大學醫院集合，高喊「雅克石下台」，要求和政府就國家前途進行對話，示威人羣越聚越多，超過萬人以上，算是二十年來最壯觀場面。由於隊伍朝向市中心移動，遂遭武裝警察棍棒襲擊，鎮暴部隊並動用催淚瓦斯予以驅散。布拉格警察當局對手無寸鐵的學生施暴，立即引起大學生和市民的不滿。於是「反共」情緒高昂，二十年被壓抑的憤怒之氣有如「壓力鍋」，隨即爆發，威力十足地衝破共黨強行設定的社會枷鎖，一波又一波的人民大眾走上市中心廣場，在十天之內，每日的示威羣衆由數萬人增加到三十萬人。顯然地，共黨的權威防線在一股勢不可

擋的人民自發性力量挑戰下，宣告失守。

(二)反對力量挾羣衆運動餘威，快速整合成立「公民論壇」，足可對捷共政權制衡。十一月十九日包括「七七憲章」人權運動組織在內的十二個反對團體公開宣布成立「公民論壇」。參與此一反捷共政府組織的發起人，除了劇作家哈維爾、「布拉格之春」時代的外交部長哈雅克(Jiri Hajek)等著名異議人士外，尚有不滿政府施政作爲的官員，以及「非共」政黨的高層領導和工人代表等三百餘人。「公民論壇」的主要訴求：其一，共黨領導階層應對一九六八年華約集團的入侵及隨後二十年國家之衰退負責，這些人應立刻下台。其二，內政部長和布拉格共黨領導人對十七日的鎮壓行動負起政治責任引咎辭職。其三，成立包括「公民論壇」代表在內的調查委員會，調查血腥鎮壓學生示威的責任。其四，釋放政治犯，並開放新聞自由。「公民論壇」有組織又有清晰的綱領，使這一次要求改革的社會運動，出乎意料的成功。

(三)知識分子、學生和工人大團結，迫使捷共放棄「一黨專政」，回歸民主。羣衆示威浪潮升高之初，捷共試圖力挽狂瀾，扭轉危機，國防部長於十一月廿四日曾揚言，若出現無政府狀態，軍隊將進行干預，以保衛社會主義。不過，因爲北京「六四天安門事件」引起全世界輿論的公憤，陰影猶在，加上內外環境的不利因素，捷共領導階層只好在「動武或改組」之間，兩害相權取其輕，以更換領導人來緩和內部的緊張。因此，甫上台剛兩年的雅克石不得不悄然退位（十一月廿四日），而改由一位與鎮壓「布拉格之春」毫無瓜葛的新面孔烏班內克接任。但是，捷共倉促的反應，爲時已晚，反對力量乘勝追擊，對布拉格領導階層的更替，不但不表滿意，反而進一步要求捷共放棄權力壟斷，成立聯合政府。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全國性兩小時警告性大罷工下，捷共已

深切體認，民主潮流難以抵擋，乃於十一月廿九日放棄共黨在憲法中領導一切社會力量的保障條款。隨後，在十二月九日政府大改組，二十一名聯邦內閣成員中，有十一名為「非共」黨籍，成為一九四八年以來，首次由「非共」領導的政府，最引世人注目者，曾屢遭迫害坐牢的著名劇作家哈維爾，於十二月三十日被推選為總統，接替保守強硬的胡薩克（十二月十日被迫辭職），而領導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深受人民擁戴的杜布切克，則於十二月廿八日膺選聯邦議會主席。由此，布拉格的政治氣候大為改觀，二十一年的「冰冷嚴冬」宛如「大地春回」，充滿生機，一片欣欣向榮景氣。次年三月廿九日，聯邦議會又正式通過決議，把原來的「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國號，更改為「捷克和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國家社會主義」的中央統制終被畫上休止符，成為歷史名詞。

（四）舉行自由選舉，恢復議會民主體制。繼東德、匈牙利和羅馬尼亞舉行戰後第一次自由選舉之後，捷克也在六月八日舉行大選。聯邦議會採二院制，即人民院和民族院，前者有一百五十名議員，按人口比例產生，後者有一百五十席，由兩個共和國各分配七十五席。這項一九四八年以來首次自由選舉的結果如下：人民院——公民論壇及「公眾反暴力組織」四十六點六%八十七席、共產黨十三點六%二十四席、基督民主聯盟十二%二十席、摩拉維亞——西里斯社團五點四%九席、斯洛伐克民族黨三點五%六席、「共存」組織（少數黨）二點八%四席。民族院——公民論壇及「公眾反暴力組織」四十五點九%八十二席、共產黨十三點七%二十四席、基督民主聯盟一點三%二十席、斯洛伐克民族黨三點六%九席、摩拉維亞——西里斯社團三點二%八席、「共存」組織（少數黨）二點七%七席。在這次選舉中所反映的訊息，至少有三點頗具意義：其一，投票率高達九

十六%，是所有東歐國家首次舉行自由選舉最高記錄者，正顯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政治意識強烈，有高度警覺性，積極參與投票始能解除共產黨根深柢固的權力。其二，共黨得票率只有十三%，雖名列第二位，但與「公民論壇」的差距甚遠，這不但說明了共黨已喪失民心，而且也證明了過去的選舉完全由共黨操縱，毫無公平可言。其三，「公民論壇」整合反對力量，推翻了共黨政權，贏得民心，選民寄以厚望。

柒 新政府的經濟改革與展望

捷克六〇年代和八〇年代改革運動的相同處在於兩者都是因為經濟危機而起。在蘇聯式社會中，政權不穩定的最主要因素總是由於經濟指導部門的無能所引起的，例如：一九五三年的東德，一九五六、七〇和八〇年的波蘭，以及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等，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亦屬同類。而每當改革運動被鎮壓下去，共黨領導人爲了保住政權，於是不得不進行經濟改革，因此經濟危機實是促成經改的主要因素。然而過去各國共黨政權之經濟改革成效總是有限且短暫，主要是由於政治與社會結構未同步改革之故。

捷克「十一月革命」後以哈維爾爲首的新政府所面對的經濟危機雖與六〇年代末的情況一樣糟，但因政治層面的同步變革，使其經改成功的可能性大增。新政府所提出的經濟改革概念與理想，遠非六〇年代共黨政權所能比擬。簡單地說，就是放棄計畫經濟，改採市場經濟。以下就哈

維爾政府的一些經改措施加以介紹和分析。

一、過渡到市場經濟的具體措施

作家總統哈維爾所領導的政府，在這轉型期中，一方面接受經改小組所提之完整且有效的改革建議，另一方面則不斷地重用一些傑出人士（他們大都亦是「公民論壇」中的活躍分子）。目前新政府所提之改革方案主要有下列四點：

一、有關財產關係方面

捷克國會於一九九〇年四月十八、十九日通過四項法律，使私有財產的發展得到具體可循的方向：

（一）國營企業法：已於一九九〇年五月一日生效，其與一九八八年之不同處在於：（1）簡要且適合市場經濟的需要；（2）加強主管的重要性。按一九九〇年初通過的草案建議，國營企業有三種，其一，是由一主管管理處經營的企業，如郵政、鐵路等公共企業；其二，是設立監督委員會和管理董事會的國有資本公司，這種公司其實只限於礦業和鋼鐵業兩種，其主要目的在於推動下游工業；其三，是自治的國營企業，其特點是已不再有所謂的「基礎民主」（basisdemokratische form）的管理方式。

（二）股份公司法：於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生效，是以德國股份公司法為藍本制訂的，公司有監督委員會和董事會，而對於公司資金的供應與應用都有明白的規定。此法因與財產私有化有密切關係，故相當重要。

(三)外國合資企業法：這包括所有的外資企業，此法是修改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八日的法律，而於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九日公布，其比前法更能吸引外資的地方在於公共建設計畫和商業利益高。

(四)國民私有企業法：大規模的私有化是本法的主要精神，其中除了國有企業之私有化有待政府進一步規劃與立法外，目前有下列四項規定已於一九九〇年五月初生效：(1)對於私有企業之申請的核准，除專業性規定外，沒有任何繁雜行政手續的限制；(2)合夥人數沒有限制；(3)公司資產亦無限制；(4)在法律範圍內，每個私有企業有權與外國做生意。

二、有關價格政策方面

目前由中央主管決定的價格關係必須經由取消對基本民生物資及其他產品的補貼，或經由貨幣貶值和提高能源價格使其達到世界水平的方式，使價格制度快速地變革。由此而可能引發的通貨膨脹壓力，可透過加強競爭力和嚴格的金融與財政政策來緩和之。同時，既是供給者又是需求者的國營企業、合作社和私有企業等，應共同商定消費與資本貨品、民生物品、私有服務業的價格。此一「商定價格」(Vereinbarungspreise)關係到廣泛的貨物分配。

三、有關資本市場方面

與六〇年不同的是未來市場經濟的操作要擴展到金融、資本及外匯等範圍。經由國家銀行作業範圍內之商業部門的劃分及依此而建立的一些商業銀行，是建立合乎市場經濟之金融與信用貸款的基礎，而且可以作為外來資金的核准單位。事實上，一九八九年開始，企業已可保有外匯。企業外匯買賣、交易所的開放、財產政策、貨幣之可兌換性等措施，已為建立資本市場立下了里程碑。

四、有關勞力市場方面

建立未來勞力市場的改革建議主要強調以下四項要求：(一)要有合乎市場要求的效率刺激(Leistungsanreize)；(二)依市場條件而定工資；(三)裁撤冗員與無效率的單位；(四)工資政策不能與貨物及金融市場的平衡政策相衝突。

其他有關貿易自由化的推展，亦是建立有效市場機制的條件，在這方面，外國合資企業法、股份公司法 and 國民私有企業法扮演重要的角色。

二、捷克未來經濟政策的取向

捷克的經濟改革者認為國家的經濟政策相當重要，這是他們從其他東歐國家（例如：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學來的教訓。他們認為目前最重要的乃是「穩定政策」(Stabilitätspolitik，捷克學者稱之為平衡政策(Gleichgewichtspolitik))。

平衡政策特別是要在總體經濟方面避免不平衡，尤其是投資部門。國內則著重消費市場的平衡，即注意人民的收入與消費品的充分供應；至於外貿方面亦應避免不平衡，在這方面，一九八九年捷克外債雖高達八十億美元，但最近的國際收支良好。與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蘭比起來，過去的通貨膨脹和高外債已大有改善。在擴大國家支出與企業的貸款方面，捷克財政部一反一九八九年的赤字預算，於一九九〇年編列稍微剩餘的預算。

另外，縮減軍費及中央機構的支出，並逐步取消對農業、礦業、住屋及近距離交通之補貼，亦是捷克財政改革新的方向之一。

鑑於過去的沉疴，要實現產業部門的結構轉變實比保持國內經濟與對外貿易之平衡要來得困難。必要的改變必須在整個已然崩潰的東歐經濟集團網路中進行，這些東歐國家與蘇聯的貿易幾乎都佔了外貿的一半以上。由於不當的外交與外貿政策，造成工業的單方面發展，如原料及能源工業、重工業、軍事工業等，造成了無謂的浪費。學者建議必須就此進行激烈的結構變革，使其成為生產有益大眾的產業，如消費品、民生物資工業、房屋興建、環保及私人服務業等。此外，捷克本身擁有良好的工業基礎和便宜的人力，因此應建立高度加工的現代工業。

基於這種考慮，學者專家們認為應把外貿重心逐漸從東歐，特別是蘇聯，移到西方市場，也就是說，在未來幾年內，捷克與東歐「經互會」國家的貿易要從百分之七十八點五降到百分之五十左右。據一九八九年的資料顯示，捷克與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已降至百分之六十四，而與「經互會」國家的貿易則佔百分之五十八左右。但要把貿易方向從東方轉向西方，則企業必須提高其效率，以符合市場競爭的需求，這對目前仍以基本原料和加工半成品為出口大宗且生產機器普遍老舊的捷克而言，實在是一大挑戰。

捌 結語

捷克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經過一次令人刮目相看的「絲絨般革命」之後，除了在內政方面穩健的走向民主大道，展現新風貌外，其對外政策方面在東歐國家當中，亦獨樹一格，甚得好評。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舉行的地方選舉，基本上可以肯定這個位處歐洲心臟地區的國家已有能力在穩定中落實民主政治。雖然該次地方選舉，共黨在斯洛伐克共和國的鄉鎮市長選戰中，頗有斬獲。共黨候選人在六百六十個市長選區中獲勝，佔全部二千八百四十個市長選區的二十三點二%；基民黨贏得五百四十一席居次，比例佔十九點〇四%；「公眾反暴力組織」得到四百七十六席，比例佔十六點七%，排名第三。在市議會選舉方面，斯洛伐克共和國兩大主導政黨，基民黨和「公眾反暴力組織」所獲席次分別排名第一及第二；共黨居第三。捷克共和國市議會選舉方面，捷克共和國總統哈維爾所領導的「公民論壇」獲得最多席次；無黨籍候選人居次；共黨亦位居第三。捷克共和國的市長是由市議會間接選舉產生。一般認為，共黨在這次選舉中表現出色，部分原因是地方選舉黨派色彩較不濃厚，選民主要以候選人的人品和聲望為考慮對象。許多今天獲勝的候選人，是一年前聯邦及捷克與斯洛伐克共黨領導階層垮台後，繼續留任的共黨籍市長。他們因為個人施政表現出色，反而較有穩固的羣衆基礎。一般咸信，捷共的式微猶如法共、義共，不可能再重整旗鼓，發揮影響力。

至於對外關係方面，布拉格新政府的作風，也令人耳目一新，例如哈維爾被推選為國家元首不久（一九九〇年二月二日），不理會中共的抗議，主動邀請西藏宗教領袖達賴喇嘛訪問捷克；駐哈瓦那和地拉那的捷克大使館也能收容一批難民，不惜與昔日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盟友翻臉，甚至於一九九〇年七月阿爾巴尼亞難民潮湧入地拉那使館區時，捷克以人道主義為由，率先派專機把一批逃進大使館的難民接往布拉格。哈維爾的「人權外交」，的確表現不凡，遠比某些號稱大國，專搞多重人權標準的政治領袖要來得高明，更具道德勇氣。再者，捷克還積極參與歐洲事務，倡

議建立新歐洲安全體系，備受矚目。布拉格倡議的新歐安體系，主要理由乃因東西德完成統一，和東歐國家的民主變革，而導致戰後形成的歐洲秩序結構起了巨大的變化，亟待調適。因此，捷克建議，可在「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CSCE)的架構下，予以制度化，定期舉行磋商，加強彼此間的互助與合作，俾維持歐洲的和平與穩定，並在布拉格成立常設秘書處，以執行經常性的連繫工作。此一倡議深得美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歡迎。看來，這個新歐洲安全體系的誕生，指日可待。

捷克和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未來的發展，很可能受到兩項主要變數的支配：其一，分離主義問題；其二，經濟改革進程。前者，布拉格為了解決中央與地方權限之爭端，很可能重新劃分為五個共和國或邦，即把現在的捷克規劃為波西米亞、摩拉維亞和西利西亞等三個共和國，而把目前的斯洛伐克規劃為東西兩個共和國。此一安排或許可以安撫分離主義，不至於使聯邦解體。後者，捷克已於一九九一年一月起，分三階段具體落實經濟改革計畫。以捷克良好的工業基礎，加上人民教育水平相當高，以及西方國家支援，其改革進程遠較波蘭和匈牙利樂觀。若在一、二年內，有明顯的改革績效，將有助於民主化進程。